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
2000年12月，頁99~119

BIBLID1012~8514(2000)26p.99~119

錢穆論清學史述評

汪榮祖*

提　要

本文以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主，評述錢穆研究清代學術史的成果。錢氏寫作之前，已見梁啟超所撰同書名之作。比較兩書，可見兩人思想與學術之異同。大致而言，論清初學者，錢梁略同；論清中葉學者，錢惡樸學之鄙宋攻朱，頗多譏評，而梁則認為乾嘉考據，甚具實證主義精神而好之。至於晚清，經今文興，梁隨康有為之後，為此一運動的推動者和宣揚者，自道有啟蒙之功。然錢穆一本尊崇宋儒之心，以及信仰朱子之執著，痛詆今文改制說之荒謬，甚不恥康之剽竊與武斷，視之為清學覆亡的罪魁禍首。於此可見，錢著與梁著立異之處，要在意識型態的不同，尚可見漢宋門戶之見的遺影，並未能在思想史方法上，有所突破。他仍採傳統的學案體，故未能將各種議題展開來討論，學術思想從一時代到另一時代轉進的過程，因而難詳，更難能顯示時代的深層動力，也不足以細究學術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時代的實際影響。一部以現代思想史方法書寫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猶有待於來者。

關鍵詞：錢穆　梁啟超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清代思想史

* 作者係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引言
二、清學史淵源
三、清中葉之考據學
四、晚清學術史
五、結語

一、引 言

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研究清學史的代表作。這部書於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之前出版，乃據北大授課講義而成。錢氏自謂，任公（梁啟超）曾在清華講授近三百年學術史，並印有講義，錢氏赴北大開同一課程，並於北平東安市場購得梁之講義，「因與任公意見相異」，故另撰一書，[1]於是梁錢各有一書名相同的著作。

錢穆及其先進梁啟超均屬名家，所著在學術史上亦有其應有之貢獻與地位，然學術不斷進步，兩氏有關清代學術史的撰述，無論在寫作方法與實質內容都暴露了嚴重的缺點與不足，此乃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之所以以今日之學術眼光評論前人，既非否定前人的業績，也非對前人要求太過，實在檢討已有的成果，知其缺點與不足之所在，冀有所突破與進展。若仍以舊日的標準，一味讚賞前人之書，認為仍具頗高的學術價值，豈非自認近一世紀來，有關清學史的研究竟然停滯不前，毫無進展？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我們應該站在前人的肩膀，高瞻遠矚，大步邁進。

本文述評錢穆論清學史，固然要指出與任公相異之處，然也要明示相同意見。無論異同，錢書都有依傍梁書的痕跡。錢書晚出十年，在篇幅上固然勝出，然思辨論證未必超勝許多，甚至在概念上有些倒退現象，故讀錢書的同時，不時參閱梁書，或亦有助於理解錢氏清學史的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

錢氏講授以及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除了自稱與任公「立異」之外，亦有闡釋清代學術史內容與流變之意。其判斷和解釋必有其思想根源，值得玩味。其寫作方法與所用史料為何？與近代思想史之寫作，究有何種距離？其主要論點為何？是否有效？影響何在？以及錢穆作為近代思想史家的地位，均屬本文寫作時思考的範疇。

二、清學史淵源

清朝享國約三百年，錢穆與梁啟超所謂三百年學術史，就是清學史，實甚顯然。梁以清學始於對晚明弊政與王學流弊之「反動」，明末西學之輸入，藏書、刻書、讀書風氣之漸盛，以及佛教反禪精神之發展，遂下開重視實踐的清學，[2]所言雖仍不免簡略，卻眉舉目張，並照顧到思潮與時代的關係，多少反映了清季西學以及新概念對他的影響。錢穆雖晚於任公一世代，思想則似乎早任公一代，故絕不提十六世紀以來西學之衝擊與反動，亦不提思想之物質基礎，逕謂清代學術導源於宋，而宋學又導源於唐之韓愈，其意清學既揭漢敵宋，若不知宋學，便「無以平漢宋之是非」。[3]欲知宋學，必須追蹤到唐宋。若然，則近三百年學術史應作近九百年學術史矣。其實，明末清初對宋學之反動，並非完全反對宋學；所反者乃宋學之流弊，而流弊見之於三百年前，實在沒有必要追溯到九百年之前。

錢穆論清學淵源時，也特別強調晚明東林學派的重要性，若謂東林不僅「矯挽王學的末流」，而且「抨彈政治之現狀」。[4]不過，問題是東

1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141。

2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91~102。

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1。

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是否可稱清學的先驅？錢氏雖亟言，清初大儒或導源於東林，或為東林之嗣響，然亦自認清代之實學固非東林之所謂實學，康雍以往，更「渺不相涉」。[5]然則，錢氏逕謂「清初學風盡出東林」，[6]無乃太過？事實上，錢氏首章所討論的黃梨洲、王船山、顧炎武三鉅子，才是清學的先驅人物。諸人背景雖異，皆欲糾空談心性之弊，以實學濟之，並有以用世，也就是梁啟超已經做出的定論。錢氏在論述這些先驅時，也頗襲用梁氏原語，或轉引梁氏引文，小傳照抄梁書之處尤多，最明顯的莫若船山傳略有曰：「其遺書，得七十七種，二百五十卷，此外未刻及佚者猶多」，[7]僅易任公所記「佚者不少」為「佚者猶多」。然而梁氏誤記卷數，錢穆照抄而未查書，故而沿誤。按船山遺書初刊於1842年，上海太平洋書局1930年重刊，計七十種，二百八十八卷。吾國傳統文士，轉錄前人之書，習以為常，未必能以現代西方規範論之，然錢氏僅言與梁氏之異，而不及其同，不得不表出之也。

黃王顧三人在現代被視為清初學術思想之鉅子，學者景從無礙，多少歸功於梁錢兩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肯定，而兩人對三氏的評價也大同小異，主要觀點可說相當一致。梁首揭梨洲雖出自陽明，實已提出致良知的新解，謂致即行，以救王學空疏之弊，並將之比作「近世實驗哲學的學風」，也許未必有當，然其斷定「梨洲不是王學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學的承繼人，他是王學的修正者」，[8]則頗言簡意賅而不可移。錢穆所謂，梨洲「重實踐，重功夫，重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墮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9]並未超出梁任公所提致良知的新解。

錢穆論梨洲政治思想一節，多取《明夷待訪錄》，所論與任公也少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8~19。
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20。
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5。
8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45。
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異，引文亦略同，認為黃氏已具民主之創闢思想。所異者，主要是《待訪錄》之所以作，任公不同意章太炎所謂「將俟虜之下問」，也就是說，期待清廷的青睞，而正恰恰相反，實欲「為代清而興者說法」。錢穆則據全祖望之言，謂成書之時（1663），「潮息煙沉，已無可望，更無可待，故而《待訪錄》成於梨洲五十四歲，實為梨洲政治興味最後之成績」，此後則轉入理學方面。[10]然而，事實上梨洲並未放棄他最後之政治興味，似乎仍有所待。據1985年寧波天一閣新發現的《留書》抄本，知乃《待訪錄》之底本，成於前十年，有序曰：「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無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11]足見梨洲仍有待於後人，以實行其主張。然其所待者，絕非狹隘的某一類人；其胸懷固非近人之比。

錢穆於任公讚賞梨洲《待訪錄》所言近似西方民主學說，雖無異詞，卻有一語暗批任公曰：「今讀其書者，驚其立說之創闢，而忘其處境之艱虞，則亦未為善讀古人書矣」。[12]任公並非不知梨洲處境之艱虞，若謂「凡豪傑之士，往往反抗時代潮流，終身挫折而不悔」。[13]蓋正有此挫折之處境，始有其創闢之見；不顧處境之艱虞而持此創闢之見，正梨洲之所以異於常人也。錢與梁對梨洲的看法，實大同而小異。

王夫之號船山，其書至十九世紀中葉始出，才引起重視。梁啟超雖自稱未通讀王書，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予王學極重要的位置，並首以西洋哲學概念描述王學，謂「為宋明哲學闢一新路」。[14]錢穆論船山，承襲梁書的痕跡顯然，觀點也基本略同。梁推崇船山以治哲學的方法治學，「比前人健實多了」。[15]錢亦以哲學之本體論述王學之能顯真明體，並推而演之曰：船山「理趣甚深，持論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

1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3。

11 李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6。

1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5。

13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52。

14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15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臺灣大學哲學系圖書館藏

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閎闊，幽微精警，蓋無多讓」。[16]

梁揭出王夫之「反對純主觀的玄談」，[17]而錢亦言船山切中流俗，砭「後世言心者，蹈虛落空之病」以及「虛知浮解之無當本體」，蓋其「發明性道之幽玄，本於人事生理之實也」，故而既不空談心性，也不因重功利而忽心性。[18]此論也未脫任公所說，船山提倡實行而不廢原理。[19]錢穆固標出船山喜言變動與宇宙演化之妙，謂王氏人文進化之說，「閎闢深博」。[20]唯船山之演化觀，不僅演進化，也演退化，道出文化有興亡起伏之跡，實為一「石破天驚」之論，[21]惜錢氏未及見之。

錢穆甚賞王學，未嘗不因認為王學「繩律之嚴，仍是宋明儒家矩矱」，尤與張載《正蒙》的學風為近，[22]展露錢氏一貫崇宋之主見，亦因而相較之下，顏元汩於習行，戴震耽於情恕，以錢之見，皆不如船山之正。然以錢氏之嚴夷夏之辨，於論呂晚村一節，多有發揮，竟未就船山貴華賤夷的強烈民族本位政治與歷史觀，大加論述，僅以「《黃書》於種性夷夏之防尤謹嚴」，[23]一語帶過，未免失之交臂。

錢穆論顧炎武，雖然在傳略與引文上頗採梁書，但論點頗異。錢穆一則曰，「亭林之治古音，乃承明陳第季立之遺緒」，以駁梁氏稱亭林為漢學開山之說，[24]再則曰，經學即理學，「亦非亭林首創」，因錢牧齋已先言之，意在駁斥近人「既推亭林為漢學開山，以其力斥陽明良知之說，遂謂清初漢學之興，全出明末王學反動，夫豈盡然」？[25]錢氏於

1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96。
17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3。
1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12、114。
19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82。
2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15。
21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681。
2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14、116。
2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20。
2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35~136。
2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37~139。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顯然在挑戰梁啟超所謂「論清學開山之祖，捨亭林沒有第二個人」；[26]然而細察之，錢穆對亭林的結論，實亦清初不作第二人想，不僅認同任公總括顧學「博學有文，行己有恥」之精到，而且認為並世學者「皆不足相肩並」，「要其意氣魄力自足以領袖一代之風尚」又謂「以後清儒率好為纂輯比次，雖方面不能如亭林之廣，結撰不能如亭林之精，用意更不能如亭林之深且大，然要為聞其風而起者，則不可誣也」。[27]然則，錢穆雖不云亭林為漢學開山，實已肯定其開山之功，與任公所言，大同之餘，小異耳。

總之，清初學者莫不針對明末空疏之弊而發，故提倡實學。清學之淵源於此亦顯而易見。錢穆雖言清學源自宋，然並不能無視清學乃宋學流弊之反響。太炎所謂，宋學至清已「竭而無華」，亦屬事實。錢穆對於清初三鉅子的評價，實與梁啟超所見略同。

三、清中葉之考據學

錢穆以傳統學案體寫學術史，但見學人先後出場，卻難見學術與學派之演變。乾嘉考據代表清學的全盛時期，但錢書實未能盡道其來龍去脈，而於顧炎武作為清代漢學開山之說，亦頗持異議。雖仍以乾嘉考據，上承亭林，然承襲之跡不明。白壽彝曾批評錢穆將顧視為復古主義者、道學先生、抄書匠，歪曲了亭林考據學的優良傳統，[28]雖言之尖刻，不謂無見，錢穆尤其不應誤解亭林所謂著書不如抄書之真意。顧氏之意，僅僅是說，盜竊或改竄他人的著作，還不如忠實的抄書，而此一誤解，確也可能曲解亭林以考據為目的而非手段。所謂上承亭林，是否即延續復古與抄書的傳統？顯然不是。

梁啟超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長篇結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

26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53。
2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146、145。
28 白壽彝，《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1961），272~273。

臺灣人學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總成績」，實係對乾嘉考據學的詳細總結。[29]由此總結可知，所謂乾嘉考據學，確不免餖飣煩瑣；為考據而考據之譏，亦非無據。今人探究考據極盛之故，常謂專制政權禁錮思想所致，然也不能忽略，乾嘉正當清之盛世，始有人力物力進行大規模的考證工作。其結果對古籍的復原與整理，對文化的承繼，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余英時提出的「內在理路」說，謂乃自明末清初以來，重視「道問學」的自然結果，[30]能以內緣說補外緣說之不足。惟道問學與尊德性乃一體之兩面，殊不可一分為二。

錢穆論乾嘉鉅子，以專章述戴震（東原）與章學誠（實齋），於兩氏學術思想之交涉，語焉未詳，後由其門人續成之。[31]戴震與章學誠雖為乾嘉之要角，未得謂包攬乾嘉時代學術思想錯綜複雜之全貌。錢書論及乾嘉時代，也未暇多言時代與學風的關係，亦看不見亭林考據學發展至乾嘉的過程，以及兩者間之異同。

休寧戴震（東原），可說是乾嘉時代最享盛名的學者，不僅在考據上別開生面，從字義、名物、度數以通經意，所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而且在義理上更頗有發明，尤令後世學者敬佩。胡適之就把戴東原的哲學等同英國講求實用的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視為清初以來反玄學運動的成果。[32]梁啟超也說，東原所言，「絕似實證哲學派之口吻，而戴震之精神見焉，清學派之精神見焉」。[33]梁胡兩人皆將漢宋之爭，視為實學與玄學之爭，而尊漢鄙宋之意溢於言表。然此恰非錢穆所能接受，並見諸其論述之中，如謂東原學自江永，徽歙又是朱子故里，風尚篤實，原亦尊朱；所謂戴學原出朱學，章實齋已先言之，惟錢穆認為東原論學之變，由於受到惠棟的影響，始尊漢詆宋，亦因而使錢詆戴，若

29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294~520。
30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1976），121~156。
31 余英時，《論戴震與張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32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北：商務印書館 1971），70-71
33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1。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謂「東原在四庫館，盜竊趙東潛校《水經注》，偽謂自永樂大典輯出，以邀榮寵，其心術可知」，[34]則又效實齋之叱戴矣。胡適之窮畢生之力治《水經注》，不亦為戴氏辯誣乎？

學者間相互激盪，事屬平常，然東原是否聞蘇州惠氏之風而變，並無確據，一如胡適疑心《孟子字義疏證》和《原善》受到顏李學派的影響，沒有確據。[35]但東原的學術思想，卻可分前後兩期，而後期才代表他成熟的學術與思想。即使他最後受到惠棟的影響而變，他的學術之精深，已遠遠超過惠棟。戴學既不能歸功於惠棟，亦不能將戴之抑宋攻朱，怪罪於惠棟，更不能說，戴助惠奪宋儒講義理的傳統，何況學術思想之變，不可能突然發生，而是其來有自。余英時研究戴震早期作品《經考》與《經考附錄》，發現「東原後期思想的發展大致都可在此早其作品中得其根源」。[36]然則，戴氏思想有變有常，仍具思想發展的一貫性。東原晚年從辨性欲到辨理氣到辨理欲，亦有其一定的發展過程，似非任何外人所能主導。

錢穆雖認可東原考證之精卓，然並不認同其義理。太炎嘗言，戴之名著「《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出，學者自是薄程朱」，[37]而錢穆尊崇朱子，始終如一，晚年撰百萬言《朱子新學案》，開宗明義即謂：「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瞻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可與倫比。」[38]錢穆既仰視朱熹如此，自不能容忍批宋攻朱之論，故斥東原所論「激越」、「深刻」、「詆毀逾分」，於東原頗致憾焉，亦因而下視東原曰：「余觀船山議論，頗多與東原相同，然船山極尊宋儒……其識超於東原矣」，[39]因亦頗為借重章實齋批戴之言，若謂「東原以朱

3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22。

35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22。

36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154。

37 章炳麟，《訄書初刻本重印本》（北京：三聯書局，1998），160。

38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1。

3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64。

臺灣大學哲學系期刊資料庫

學傳統反攻朱子，故實齋譏之，謂其飲水忘源也」，更說學問之事不盡於訓詁考釋，以奪戴學之長，並斷言東原慧有餘而識不足。[40]錢穆恨與朱夫子為難之人，頗似方東樹。

錢氏矛頭既指向東原，於章實齋自多表同情；然章氏在乾嘉時代實遭冷遇，其書亦未出，錢穆專章論實齋，以與東原相抗衡，已張大其事，所謂「東原實齋乃乾嘉最高兩大師」，[41]亦如任公謂章學誠為乾嘉全盛期與蛻分期間一重要人物，[42]不免誇張。實齋之成為重要人物，乃後世之發現與認可；實齋之學，也多後人主觀的詮釋。[43]實齋針砭漢學家之言，既非乾嘉漢學家所知，則又何從影響其時代？

一時代學術之重要，端視其影響的深淺，以及反響的輕重。就此而言，戴震無疑是清中葉最重要的宗師。梁啟超以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為最能光大戴門之業的後學，[44]顯然著眼於正統漢學之樸學，其一脈相承，增事踵華之跡，釐然可尋。錢穆則以焦里堂（循）、阮芸臺（元）、淩次仲（廷堪），繼戴之後。三人固極重東原，亦皆受東原的影響，然未盡受戴氏藩籬。即依錢穆之見，焦循雖學宗東原，不免「溺於時代考據潮流」，但因其「富具思想文藝之才」，故思辨深湛，「可與東原實齋鼎足」，甚至「較東原為圓密」，亦因而能不隨漢學家考據之風起伏，進而能綜戴章兩家之長，自樹一幟。[45]所可議者，里堂既未得讀實齋之書，又何從綜其長乎？不過，焦循的思想，確有可述，尤其時變旁通之義與異端執一之說，非同凡響。錢穆雖言里堂旁通異端之說頗詳，[46]惜未能就兩者之意義多所發揮，如時變旁通，是否已發清季變

4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389、402、407。

4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75。

42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57。

43 汪榮祖，〈章實齋六經皆史說再議〉，收入《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

44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36。

4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55。

4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55~4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通思想之先聲？異端執一，是否已具多元思想的色彩？皆大可推論，實無須侷限於漢宋調和一端也。

阮元之學，固亦植根於東原，主古訓明而後義理明。錢穆因見阮之長於歸納，有別於焦之長於演繹，故謂阮重實事求是，近乎朱子；焦主自思求通，近乎陸王。由焦阮性情之異，以明學途之異轍，再因阮氏出處較顯，助成漢宋兼採之風。[47]錢氏此見，可稱明通。至於凌廷堪，錢穆認為亦承東原之風，雖以禮易戴之理，然論經實與戴同尊荀卿，曰「東原言性善，專就食色之性言之，與次仲言禮，專就聲色味之好惡言之，同一失也」，[48]而凌分樹禮與理的旗幟，更嚴漢宋門戶，則揚戴之風而益甚矣！唯凌亦頗道漢學流弊，不以「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為然，也不以「許慎掩周孔」為然。[49]類此皆頗合錢穆之意，錢梁標舉東原後學之異，可以略見漢宋門戶，以及兩人道術之異趣。

錢穆述論焦循、阮元、凌廷堪之餘，附錄方東樹（植之），涉及清中葉學術史上一大公案，事關桐城派挾怨攻伐漢學。梁啟超說，「方東樹著《漢學商兌》，遍詆閻、胡、惠、戴所學，不餘遺力」。惟梁氏雖說「其書為宋學辯護處，故多迂舊」，然仍謂「其針砭漢學家處，卻多切中其病，為清代一極有價值之書」。[50]錢穆則謂，方東樹之書「頗足為漢學針砭」，尤樂見其「尊護朱子」，雖云方氏「肆口無忌」，其書之水準也不及實齋之《通義》與陳澧之《學思錄》，但風格差近，皆不滿當時極盛之漢學，並可絕其病痛者。[51]但是梁錢兩氏，均未對此一公案作全面的探討，亦未追究其學術史上的意義。錢氏僅在附錄之中，稍稍涉及，隱約不彰。

按照章太炎的說法，戴震治學深邃，令諸儒震悚，願為弟子，天下人遂敬重經儒而輕文士，導致文士與經儒間的交惡。桐城派文士效法曾

4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89。

4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496。

4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06、508。

50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56。

5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18、519、520。

臺灣大學哲學系圖書資料庫

鞏與歸有光，講究依傍程朱的桐城義法，但是桐城諸子並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遭輕蔑。姚鼐想做戴震的學生，未被接納，感到羞辱，乃不斷抨擊樸學殘碎，後來方東樹寫《漢學商兌》，雖不完全是誣讕之言，然方氏本人，亦屬文士，強以宋儒自居，而行不附言，所言漢學弊端，僅僅是微識，反增糾紛。[52]近人朱維錚於此一公案，有進一步的論述，略謂姚鼐死後，江藩撰《漢學師承記》以區別漢宋門戶，又撰《宋學淵源記》，獨不記桐城諸家，因而結冤。方東樹即姚門弟子，反應最為強烈，凡與漢學有關之人，都在攻擊之列，尤集矢於戴震與揚州學派，以維護朱子與發明道統自任，學術價值雖然不高，但頗得桐城、陽湖兩派之聲援。更有進者，方東樹身後，正值咸同大亂，曾國藩輩以當世方苞自居，以明道救世自任，《漢學商兌》亦隨世變而風行一時；然而變局之下，漢宋實兩敗而俱傷，雙雙凋零。[53]朱氏所論，頗能補梁錢兩公之闕。蓋思想史之研究，不僅須追究漢宋間理性對話，且須顧及學者間之隱情私衷，亦須注意時代因素及其影響。錢穆著作體例，引一段，評說一句，不脫舊史藩籬，殊難暢述思想與學術發展之複雜過程。

四、晚清學術史

晚清學術，肇自乾嘉樸學式微之後，講求復古。乾嘉考據學風，崇尚樸實，主張訓詁明而後義理明，原是針對宋明理學末流的游談無根，然而此一學風，亦導致清代經學之流於煩瑣，僵化而枯燥，至道咸之際，衰象已著。梁任公曾以考證學研究範圍之拘迂，漢學本身因遲滯而腐敗，漢學家尊古與善疑之矛盾，以及咸同戰亂之刺激，思以經世濟時等因素，解釋盛極一時乾嘉清學的衰微。[54]錢穆論清學之衰，一本其尊宋

52 章炳麟，《檢論》（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影印本），24b~25a。

53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3~37。

54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57~5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的立場，較著眼於東原以來，樸學家力訾宋儒之非是，故述衰世之繼起者，多以調和漢宋為言，顯然以為漢宋調和乃救學與興學的良方。不過，倡言漢宋調和，即使能夠落實，是否足以應付道咸以降的世變，殊為可疑，而此一關鍵問題，梁錢兩公皆未作深論。

正當道咸學者提倡漢宋調和之際，漢學因經今文的復興而趨分裂。今文之復起，自與乾嘉箋注之學流於義理枯竭有關；然今文之闡抉奧旨，往往牽綴比附，並不能等同宋明先儒之求義理，自非錢穆所能允可，故目為好誕之風，較其弊視惠棟尤有過之，若謂「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盪搖撼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55]錢穆此語，總結經今文學在晚清的影響，認為關係到學術治道的澌滅，甚至將清代之覆亡，歸罪於經今文。此等大事，理應詳述密證其過程，明其因果，豈能一筆帶過？

梁啟超將經今文學派開拓之功，歸諸龔自珍，[56]錢穆也認為常州今文學，雖然起於莊存與，立於劉逢祿、宋鳳翔，然變於龔自珍與魏源，而龔才是此一學派「精神的眉目」，原因是龔自珍始將今文學派之輕古經，推展到注重時政。[57]龔氏確是清儒在百年文字獄陰影之餘，首開發舒政論風氣之一人，在學術上固然為乾嘉經學的反響，在思想上由政論而發清末變法的先聲，而其膾炙人口的詩篇，也風靡幾代士人。凡此皆龔氏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值得深探細究。然錢穆或因其鄙視今文之故，對龔氏的評價偏低，一謂其承襲章實齋之說，再惜其屢試不售而消極，以致於「往往有徬徨歧途莫審適從之慨」，[58]又說「定盦之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亦非能開風氣」，[59]雖可說明即使定盦也不能有所作為，卒不免自我否定其學術思想之重要性矣。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真正英雄人物終於登場，此人乃曾

5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25。

56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61。

5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32。

5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46。

5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藩（1811~1872）。此一政治人物，在思想史上固然有其重要性，如錢氏所說，國藩學業文章源自桐城姚氏，持論顯然與乾嘉漢學家異，代表晚清反考據之學風，更何況曾氏以中興元勳，提倡經世致用，以挽救士風為己任。曾氏禮論，謀漢宋會通，扶植禮教，而禮以時為大，遂達經世濟時的目的，不謂無見。然而錢氏不僅以專章述曾，而且將其學術地位與清代鉅子並列，讚褒有加，認為其見解「有其甚卓絕者」，如「以杜馬補許鄭之偏，以禮為之綱領，綰經世考覈義理於一鈕，尤為體大思精，足為學者開一瑰境」，又說「與嘉道漢學家繼東原後，專以考訂古禮冗碎為能事者，迥不侔焉」，尤推譽其特重宋學，不僅知經世而且知經術，以致於「滌生之所成就，不僅勘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閎博實，有清二百餘年故亦少見其匹矣」，故而「滌生之歿，知經世者尚有人，知經術者則渺矣，此實同治中興所為不可久持一大原因也」。[60]於此足見曾國藩在錢穆心目中形象之高大，實不作晚清第二人想，亦可略見錢穆與曾國藩在思想與意識上之相契。現代學人之中，固不僅僅陳寅恪之思想在湘鄉南皮之間也。

曾國藩之外，另一獲錢穆青眼的晚清學者，是粵人陳澧，號東塾。東塾完全是象牙塔內學者，幾無俗世名聲。錢氏以東塾身值大亂衰世，能切中時弊，深知發明訓詁而不講義理的漢學家之失，故欲挽風氣，砭流俗，主漢宋兼採，有意提倡新學風。所謂新學風，以錢氏之見，只是不分漢宋以求微言大義，且不期而與章實齋挽風氣之說相同，並響應方東樹對漢學流弊的批評。然則，所謂新學風，實無新義，更何況錢穆又說，東塾之學仍不出古訓，其意實欲漢學家勿專務訓詁，勿忘義理。若然，則東塾乃漢學之振興者，亦不得謂之新學風。另可注意者，錢穆於東塾的學術實未予多許，若謂：

> 於兩漢學術精要所在，尚未能發揮呈露，又排比眾說，不欲講家法而但求通義，其意雖是，而於兩漢四百年諸儒，流變派別，因亦無所發明。其取去抉擇，在作者雖自有微意，而自今言之，則其書亦

60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87、589、5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得謂研治漢儒思想者一完備之參考書也。

又說「其言學問偏主讀書，議論似不如顏習齋；言讀書唯重經籍，識解似不如章實齋」。[61]既如此，則又何須專章論述陳澧？原來錢穆拳拳致其嚮往之意於東塾者，因東塾力斥士情既懶且躁，不肯讀一部書，而好以勝古人，頗中錢氏當世之感慨：「今日安得東塾其人者，以上挽之於朱子鄭君，相率趨於博學知服之風，而求以作人才轉世運哉？」朱子鄭君云云，立見錢氏本人學術思想之歸宿，與夫論學好惡之所本。

康有為雖是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之「殿軍」，也就是結束清學史的大學者，但是錢穆對康之評價甚低，與梁啟超對乃師的讚賞迥異。錢氏認為，康之公羊改制說，實自川人廖平剽竊而來，甚至說，「康門學說，尚是廖季平範圍」，[62]豈不是說，若稱康門，還不如逕稱廖門？至於禮運大同之說，康雖「自闢天地」，然而「亦自有其來歷，並非絕無依傍勦襲也」，[63]而所論也不出譚嗣同的仁學。然則，依錢穆之見，康有為並無自得之學可言，錢氏清學史的完結篇遂有極為消極的結論：

> 長素之於考據如廖，於思想如譚，更所謂橫掃無前者，然亦不能自持之於後。凡其自為矛盾衝突抵銷以迄於滅盡，則三百年來學術，至是以告一結束，掃地赤立，而繼此以往，有待於後起之自為，此所以康廖譚三家之書，適成其為晚清學術之末影。[64]

「掃地赤立」，未免言之過當；蓋後起者，頗多自認受到康有為的影響。康之思想非無創意，所謂矛盾衝突也非不可解釋。康有為固然受到廖平的啟發和影響，但兩者的規模與目的絕異，殊不可同日而語。蕭公權先生之研究，已有定論（1988）。於康之評價，非蕭錢兩氏可各持一端之詞，而屬是否公平判斷之事。將康氏震動一時，影響深遠的《新學偽經

61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597、622。
6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700。
6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64。
6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68。

臺灣大學哲學系期刊資料庫

考》與《孔子改制考》，說成完全剽竊廖平幾無影響的〈知聖篇〉與〈闢劉篇〉，並不公平。既謂竊自廖平，所竊之貨，無論好壞，自應由造貨原主負責，卻又集矢於非造貨之人，逕謂「長素抹殺一切，強辯曲解，徒亂後生耳目」。[65]果如錢穆所言，其說來自廖平，則抹煞曲解之罪，豈非應歸之廖平才是？

康氏論學，確常不顧證據，強詞奪理，梁啟超亦不諱言。錢穆就純學術之觀點，批評康魯莽滅裂，亦不為過；然而不能不體會康氏著作之微旨，原不在純粹的學術考證。康明欲學以致用，甚至以學術作為達到政治改革的手段，亦因此能在思想界引發颶風和火山。錢穆認定「康氏思想之兩極端」，[66]以為戊戌變法是走急進的極端，而民國以後，反對共和則走保守的極端，似乎前後自相矛盾衝突，實則未能全面掌握康氏三世說而致誤。康有為演三世說為政治改革理論，一個基本點就是制度演變必須循序漸進而不可躐等。戊戌時期，保守勢力仍強，必須極力求變，而民國以後，未行君主立憲就遽行民主共和，有違漸進之意，造成紛亂，故極力反對。若知康氏理論之整體性，便知並無重要的矛盾或自相衝突之處。

蕭氏研究康有之最大貢獻，要能釐清康之現實面與理想面；現實面冀由改革而臻中國於現代化富強之域，而理想面則求世界大同於未來，乃分屬二個不同的境界，當前與未來的關切原本不同，並非矛盾。就康之大同理想而言，內容之豐富，誠如蕭氏所說，康有為的「烏托邦構想極具想像力與挑戰性，足列世界上偉大烏托邦思想家之林」。[67]凡細讀康氏《大同書》者，當有同感，而錢穆竟視之為「無端發此奇想」，「以空想為遊戲」，「侈張不實之論」。[68]中外烏托邦思想多矣，精深或淺薄仍有其客觀標準，非僅憑個人好惡同情與否而能斷言者。錢氏惡今

6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52。

66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678。

67 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451。

6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737、7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視改制為荒誕，無從體會康有為思想之重要與意義，失之多矣！

西力東漸，乃康有為及其同時代有識之士無可迴避的挑戰，故探討晚清學術思想必不能不細考西方因素，而西方因素正是錢穆論晚清學術史之最大盲點。他仍持有根深蒂固的本位主義思想，譴責用夷變夏，而不去處理西方衝擊與中國反應的新時代課題，以致於在錢氏筆下，清代學術思想傳到康有為，變得矛盾衝突，一無是處，無所適從，而有「掃地赤立」的錯誤結論。

五、結　語

錢穆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也不脫傳統的義理，尤重宋儒朱熹。這部書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紀的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也未脫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錢氏自身之學術思想背景如此，其論清學史亦只能選取若干學者，述其傳略，摘取其著作要點，以其個人的信仰加以評論而已。取樣不廣，難見學術思想之全貌，一時代精神文明的整體，只能說是學者之學術思想列傳。其所論清初學者，議論與梁啟超略同；論清中葉乾嘉考據學，則與梁較異，錢惡樸學鄙宋攻朱，頗致譏彈，而梁則甚喜樸學的實證風尚；論晚清則錢梁所見絕異，道咸以後思想之變局，莫重於經今文的勃興，學者由論證而圖政改，康有為以學人推動變法而至高峰，故梁視康乃晚清今文運動之中心，斯學之集成者，而自稱今文學派最猛烈的宣傳者，亦自認學術活動雖具政治色彩，然寄望於新時代之啟蒙，甚為殷切，[69]意頗樂觀。錢則視今文改制說，荒誕不經，較惠棟猶有過之而無不及，視康有為如學術之罪人，以其為清學之總結，亦足見政學俱亡之不可挽

69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68、69、86~88。

臺灣人學與術期刊資料庫

救，其情悲觀。兩氏背景與思想俱異，遂有頗不相同的學術結論。

從現代的思想史研究而論，錢穆與梁啟超在方法上均無多突破。現代思想史貴知在特殊歷史時間中，思想與思想間的相互影響與演進，以發現其時代思潮的特徵，而時代思潮面向須廣，非僅由名家巨著所能形成，於不見經傳的短簡小冊之中，也可窺測時代思潮的趨向。時代思潮錯綜複雜，非必一致，同中或有異，而由一時代轉變到另一時代，也非乾淨利落，往往新光映幕而舊影猶在。清學史自早期經中期到晚期的縱橫發展與演變之跡，以及在整個思想史上的意義，猶待在先賢開拓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紀念錢穆先生逝世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00年11月24~26日），承主辦單位臺大中文系同意在此刊登，敬申謝意。

（責任編輯：洪麗完　校對：胡雲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上、下冊，長沙：岳麓書社，1986。
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廣文書局重印再版本，1977。
白壽彝，《學步集》，北京：三聯書店，1961。
江藩著、周予同選註，《漢學師承記》，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
朱維錚，《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汪榮祖，《康章合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康有為》，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章實齋六經皆史說再議〉，收入《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
李明友，《一本萬殊：黃宗羲的哲學與哲學史觀》，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1976。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臺北：三民書局，1991。
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北：商務印書館， 1971。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梁啟超，《梁啟超論清學史兩種：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
章炳麟，《檢論》，臺北：廣文書局影印本，1970。
———，《訄書初刻本重印本》，北京：三聯書局，1998。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逯耀東，《且作神州袖手人》，臺北：允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 年。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宋明理學概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
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社，19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ian Mu's View of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Young-tsu W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Virginia Polytechnic &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Qian Mu's study of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focusing on his well-known book entitled *Zhongguo jinsanbainian xueshushi* (A history of Qing scholarship during the recent three hundred years). Attention is given to several basic questions: What incentive did Qian Mu have in mind when he embarked on writing this history of Qing scholarship? How did he handle his sources? Did he argue reasonably and logically? What was the form of his historical exposition? Would his admission of anti-Manchu prejudice affect his thinking and interpretation on Qing scholars? Generally, would his study of Qing scholars represent a high-level craft 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

Qian's intellectual history basically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xuean* style of writing. Hence, it is mainly a collection of short intellectual biographies from Huang Zongxi to Kang Youwei with annotated commentaries. Each chapter begins with a brief biographical note before highlighting principal ideas and thoughts, showing little transition of ideas and thoughts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In general, Qian's views of early Qing scholars had few, i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y, differences from his predecessor, Liang Qichao, who had written the exactly same titled book. The interpretations of middle-period Qing scholars, however, show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Qian and Liang, mainly because of Qian's strong preference for Neo-Confucianism. He showed virtually no tolerance for those who criticized Zhu Xi, whom he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Confucian scholar next only to Confucius himself. On the other hand, Liang prais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mid-Qing scholars, which he cherished as the source of modern Chinese scholarship. As for the late Qing period, Qian had no respect whatsoever to the rise of New-text Confucianism and condemned its application to political reform, which he denounced as arbitrary and farfetched. He thus held Kang Youwei in great contempt. In Qian's opinion, Kang's arbitrariness and inconsistency delivered such a fatal blow to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larship that later scholars would have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On the contrary, as the principal disciple of Kang, Liang honored the New-text movement as the force that had enlightened a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 The different conclusions drawn from the studies of the same subject made manifest the contrast in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y between the authors.

Keywords: Qian Mu, Liang Qichao, Q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